



湖北国学大师评传丛书

黄侃 评传

司马朝军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湖北国学大师评传丛书

司马朝军 著

黄侃 评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侃评传/司马朝军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7

ISBN 978-7-216-09510-5

I. 黄… II. 司… III. 黄侃(1886-1935)—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6866号

责任编辑:朱小丹

封面设计:汪 汉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王铁兵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10毫米 1/16

字数:371千字

版次:2019年2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9510-5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27

插页:3

印次: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79.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湖北国学大师评传丛书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蒋祝平

主 任 韩忠学

副 主 任 郭齐勇 王玉德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亭 王玉德 刘传铁 孙劲松

邹贤启 张良成 陈明江 周国林

周积明 姚德海 骆郁廷 郭齐勇

韩忠学

主 编 郭齐勇 王玉德

总 序

郭齐勇

“国学”是颇有争议的复杂概念。在清末以前，古人不必使用这一概念。在国势日颓、民族危亡之时，流亡在日本的志士仁人开始利用日本人的这一名词，表述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章太炎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①

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②也就是说，国学不仅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而且还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国学的内核主要指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根本精神价值。

梁启超积极引进西学，然而对于国人鄙薄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却心怀忧虑。他说：“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

^① 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原载《民报》第7号。转引自汤志钧：《导读》，《国学概论》（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② 邓实：《国学讲习记》，原载《国粹学报》第19期。转引自汤志钧：《导读》，《国学概论》（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①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握自家文化的真精神、主体性与特质，并加以锻造、锤炼，不能从盲目崇拜古人转向盲目崇拜洋人，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糟粕，中国百事不如人。

文化的差异不仅只是时代性的差异，也有民族性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国学”即是中国的古典学，它以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终极信仰、学术思想和民俗文化为中心。按传统图书与学术之分类有经、史、子、集四部，或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的诸路向。

其实，国学是开放的，包含了历朝历代消化吸收了的外来各种文化。我们不能把国学狭隘化。第一，国学不只是汉民族的学术文化，它包含了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及其与汉民族的交流史。第二，国学不只是上层精英传统，还包括小传统，如民间民俗文化，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传说、音乐、歌舞、技艺、建筑、服饰、礼仪、风俗、宗族、契约、行会、民间组织等，有如今天的某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国学还包括历史上中外地域文明的交融，如外域文明的传入，西域学、佛学及其中国化，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与历史过程等，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必须明了，国学、经史子集等，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其中包含、汇聚了中华各民族的智慧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正所谓“一体多元”，“和而不同”。古今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也以汉语言文字为媒介。

前面我们说过，在国学的多层面中，最高的层面还是国魂，即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的方面，那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所以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原载1902年3月10日《新民丛报》第3期，又载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3页。

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处。国学是生命的学问，儒释道三教是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肯定世界的神圣性。三教认为人性的最高体现，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希望与自然保持和谐。对宇宙的敬畏感来自我们回应最终实在的渴望，而最终实在为我们的生活指示了方向并赋予意义。我们的存在受惠于天地万物，为了报答这一份恩惠，我们必须加强自我修养，以便在存在的奇迹中完全实现人性，达到天地人三才同德。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融会的过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其实，提倡国学与拥抱、吸纳包括西学在内的外域文化并不矛盾。陈寅恪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①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对于自家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等外来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

湖北的国学传统源远流长，历史上涌现了一批学养深厚的国学大师。他们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成为国学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典型代表。宋至清末，全国的大学者都到过湖北，湖北学人在全国也享有盛誉。明清以来湖北理学与经学的特点是有独创性、开放性，倡导实学。湖北自古就有儒家重教兴学的深厚传统，清末张之洞督鄂期间尤重视文教，开放教育，对湖北文人与文化有深刻的影响。

湖北地区水陆交通方便，资讯较发达，在清末以来呈现出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状态，这就促使当地的或旅鄂的一些有思想的文化人批判、离异传统，而后又从高层次回归传统。现代多数鄂籍或来鄂的学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既开放，又有根柢，多数人最终融会中西文

^① 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的陈寅恪《审查报告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页。

化，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创造性地弘扬、发展中国文化的优长，经世致用。

湖北省国学研究会是本省从事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爱好者自愿组成的全省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的学术文化类社团组织，旨在研究、传承、推广国学，以冀绍继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了全面而精要地展示湖北国学史丰富多彩的画卷，为了纪念先贤不凡的人生与独特的学术造诣，也为了扩大湖北国学的影 响，本会2014年2月甫一成立之时，就确立了编撰一套较高水准的“湖北国学大师评传丛书”的计划。本计划拟先从近现代开始，行有余力再由近及远地全面涉及湖北籍的，或者在湖北曾长期居留、工作并产生重要学术影响的国学专家。

本丛书拟以每位国学大师为一本专书的传主，采取人生传记与思想阐论相结合的形式，一方面纵向追溯其人生经历与学问成长过程，一方面横向揭示其思想与学术之体要。每一本专著力求做到学术原创与通俗表达的完满统一。

经学会同仁研究，并请教了前辈专家，我们确立了本套丛书第一辑的传主为：杨守敬（1839—1915）、王葆心（1867—1944）、熊十力（1885—1968）、黄侃（1886—1935）、钱基博（1887—1957）、刘永济（1887—1966）、刘赓（1891—1978）、汤用彤（1893—1964）、徐复观（1903—1982）、张舜徽（1911—1992）。以上十位大家的学问专长与路向各不相同，有的偏重于经学，有的偏重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有的偏重于舆地学，有的偏重于金石学，有的偏重于方志学，有的偏重于目录版本学或文献学，有的偏重于哲学、佛学或思想史，有的偏重于古代诗词，但都是中国学问。他们的旧学基础很好，功底很深。由于他们都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其中一些学者有很好的西学背景，做到学贯中西，或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学术的理论或方法。这也是晚清、民国以来国学的特点。

湖北地区素来教育与学术资源丰富，人才济济。有一大批长期从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并卓有成绩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在全国乃至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之人。这是本丛书计划得以拟定与高水平完成的基本保障。

本丛书的作者也以湖北学人为主，当然也不限于此。为保证质量，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物色了学有专攻的有实力的专家。作者们十分投入，克服了重重困难，为读者奉献了智慧与心力。我们诚挚地感谢各位作者集文字、思想、学术于一途的努力。

在当前国人文化自觉意识日增与国学复兴的背景之下，推出这套丛书可以将湖北国学系统地展现出来，增进人们对于国学本身，尤其是湖北国学的了解；可以使大师们的思想与学术结合其鲜活具体的人生真切地呈现出来，培育人们对大师人格与学问的景仰以及对国学的热爱；另外，这套丛书亦将代表湖北国学研究会和湖北国学界，为全国范围内正在兴起的国学热做出正能量的贡献。

本会会长韩忠学先生极为关心丛书工作，亲自指导，确定编写主旨，筹措资金，联络出版单位，敦促写作计划的完成。丛书主编之一的王玉德教授为确立传主名单、物色作者、落实写作计划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亲自撰著了一书。王巧生博士为制定体例、联络作者做了一定的工作。

我们要特别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各位编辑为本丛书所做的贡献。王建槐总编、祝祚钦主任自始至终为本丛书高质量的编辑出版尽心尽力。

是为序。

丙申年初夏于武昌珞珈山麓

小 引

我在中学阶段就开始与黄侃结缘，课暇细读了陆宗达先生的《说文解字通论》一书，初步涉猎了黄侃的学说。1986年秋天，我有幸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这是章黄学派的重镇——黄侃的弟子刘赜、黄焯两位大师长期在此绦帐谈经，殷勤传学。入学当年我在梅园新华书店购买的第一本书就是中华书局影印本《说文解字》。很快又根据黄侃开列的国学书目，按图索骥，一一攻读，并选择黄侃生平与学术作为突破口，搜集资料，为他编撰年谱，20岁时就完成了初稿，后来不断地增补修订，这部处女作直到2005年才公开出版。因为《黄侃年谱》，30年间我与几代学者结缘。既得良师益友之扶持，亦遭劣师损友之中伤。

多年前，郭齐勇先生鼎力推荐由我撰写《黄侃评传》，尽管当时手头的事情堆积如山，我也只好将其他事暂时放到一边，开始为黄侃的日记作校注，为他的诗集、词集、文集作编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学术界亟待攻克的重大难关。为了写《黄侃评传》，别无选择，只好破釜沉舟。年谱便于操作，只要材料齐全即可；而评传需要选择，需要构思，需要再度创作，更需要深度解释。而对这样一个独特传主，确实难以解释。一是他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二是他所处的时代又极其复杂，与他相关的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都异常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重新评价的人物太多太多，需要重新评价的问题太多太多……

本书初稿完成之后曾经请杨逢彬、师领两位畏友审阅。他们都提出了极为中肯的批评意见。逢彬兄建议我学习“零度写作”的方法。此法源自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现在零度写作则指作者在文章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将澎湃饱满的感情降至冰点，让理性之花升华。尽管我也作了一些尝试，但始

终不得其法，只好放弃。师领诸兄建议我站在人类文化史的制高点上，来一个高屋建瓴，指出章黄那一代人迈出的是第一步，五四那一代人迈出的是第二步，现在我们应该迈出第三步。这种大视野对我很有启发。《易·兑·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昔年在珞珈山上，时常与逢彬、师领诸兄切磋，朋友讲习，互相启发，共同促进。此稿尤得二友郢削，谨此致谢。李婧博士撰写了部分章节，高谊可感，特此鸣谢。

近日获读东京大学林少阳教授《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一书。该书大胆质疑“革命”与“改良”二元对立的晚清思想史叙述框架，提出了“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的新概念，以章太炎为主，也可以与黄侃对接，故对本书的修订也具启发意义，对于黄侃的历史定位尤具启迪意义。如果说五四一代倡导的是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那么章太炎、黄侃倡导的就是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相反相承，各有千秋。扬此抑彼，是丹非素，皆非通论。

在极度亢奋之中写出初稿，原稿中持论不乏尖锐之处，编辑一一为之指出，建议删改。修改时尽量笔削，务求平允，平心静气，以合中道。间有不平之气，留待日后消磨。

司马朝军

2016年4月6日于武汉观衡轩

2017年6月3日修改于上海文淙阁

目 录

引言：作为“国故之魂”的黄侃·····	1
---------------------	---

上编 生平篇

第一章 黄侃的家世与师承·····	21
第一节 黄侃的家世·····	21
第二节 黄侃的师承·····	36
第二章 黄侃的青少年时代（1886—1911）·····	47
第一节 庶孽·····	47
第二节 秀才·····	60
第三节 造反·····	72
第三章 黄侃的壮年时代（1912—1926）·····	86
第一节 流动（1912—1914）·····	86
第二节 在北京大学（1914—1919）·····	105
第三节 在武昌（1919—1926）·····	158
第四章 黄侃的最后岁月（1926—1935）·····	185
第一节 在北京师范大学（1926—1927）·····	185
第二节 在东北大学（1927—1928）·····	208
第三节 在中央大学（1928—1935）·····	219

下编 学术篇

第一章 黄侃的小学研究·····	251
第一节 黄侃的音韵学研究·····	251
第二节 黄侃的训诂学研究·····	264
第三节 黄侃的文字学研究·····	270
第四节 黄侃小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278
第二章 黄侃的经子研究·····	291
第一节 黄侃的经学成就·····	291
第二节 黄侃的解经方法与特色·····	309
第三节 黄侃的诸子研究·····	315
第三章 黄侃的文学研究·····	326
第一节 黄侃与“选学”·····	326
第二节 黄侃与“龙学”·····	335
第四章 黄侃的文学创作·····	347
第一节 黄侃的诗·····	347
第二节 黄侃的词·····	380
第三节 黄侃的文·····	390
第五章 黄侃的学术宗旨与影响·····	400
第一节 黄侃的学术宗旨·····	400
第二节 黄侃的学术影响·····	410

引言：作为“国故之魂”的黄侃

黄侃是中国近代最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与弘扬，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最基本的文化取向，也是他们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根本原因。国粹派、孔教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本位文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皆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对传统文化持的是维护和弘扬的立场。^① 黄侃与上述各种派别皆有互动，成为举世公认的国学大师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他是《国故》的主编，也是“国故之魂”。

一、“开倒车”：时贤的冷讽热嘲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陈独秀可能是最早提出“章黄之学”“章黄之徒”等概念的人，当然他对章黄之学、章黄之徒颇有微词。黄侃与陈独秀分属于不同的文化营垒：一为国故派护法，旨在昌明中华固有之学术；一为新青年领袖，提倡“民主”与“科学”。一个是拼命地守护，一个是拼命地破坏，如此针锋相对，都源自不同的文化立场。长期以来，新文化被认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旧文化成为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代名词。在“新即等于进步，旧即等于反动”的简单思维模式下，黄侃早已被新派人士视为“明日黄花”，看作是飞蛾扑火、螳臂当车式的人物，哪里是激进派陈独秀的对手？黄侃虽然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陈独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黄侃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快退出政治舞台，1914年秋天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一个纯粹的讲学家。陈独秀在他的《实庵自传》中，一开头就拿自己的“自传”与英国

^① 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休谟的自传作比较：“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确实如此，陈独秀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而黄侃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陈独秀就好比是一支长矛，不断地攻击传统，旨在革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之命；黄侃好比是一面盾牌，始终守护传统文化，以阐明固有文化为己任。平心而论，各有利弊。在西方的坚甲利炮之下，古老的中国一次次遭受失败的耻辱，中国人的自信心被打破，陈独秀在这种背景下救国救民之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旧文化与老祖宗，未免太简单太粗暴。历史早已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陈独秀的那一套“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理论则是主观片面的产物。陈独秀在《答易宗夔》中却振振有词地说：“尊意吾辈重在如意创造新文学，不必破坏旧文学，以免唇舌。鄙意却以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犹之欲兴学校，必废科举，否则才力聪明之士不肯出此途也。方之虫鸟，新文学乃欲叫于春啼于秋者，旧文学不过啼叫于严冬之虫鸟耳，安得不取而代之耶？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①“覆孔孟，铲伦常”，这就是陈独秀的终极目标。孔孟之道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积极作用与普世价值也被陈独秀统统否定掉了。中国人要过“现代生活”就必须与孔孟之道决裂吗？就非要与以孔孟之道为核心成分的整个旧文化、旧伦理、旧道德、旧思想决裂吗？为什么西方人在完成现代化的同时能够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我们却一定要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打得粉碎呢？

钱玄同在1938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批评黄侃“开倒车”：

今日灯下病而阅黄季刚之《尔雅正名评》，其书为汪荃作而黄氏评之，皆谬也。而黄氏尤谬。黄幸而为章徒，故尚能就声类以言

^① 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本字，否则将并此而不能，止会确遵《十三经注疏》之说耳。论其见解，比吴派之惠、江还要开倒车，真退化，真复辟兮！^①

杨树达也有类似的批评：

阅报知黄季刚病逝。季刚于《说文》烂熟，然其所推论之孳乳先后多出于悬揣，不足据信。大抵此君读书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清儒学问本分两派：皖派江、戴，主实事求是；吴派惠氏，主信而好古。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发展；吴派主墨守，则反之。戴弟子有王、段、孔三家，各有创见。惠弟子为江声、余萧客辈，抱残守缺而已。俞荫甫私淑高邮，太炎师荫甫，实承皖派之流而益光大之。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逆转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读《诗》必守毛、郑，治《左氏春秋》必守杜征南，治小学必守许氏。于高邮之经学，不论今古文家法惟是之从者，则力诟之，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虽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②

在他们看来，黄侃早已沦落为一个泥古不化，专门开历史倒车的老朽腐儒。是耶？非耶？

杨树达 1939 年 7 月 12 日又撰《温故知新说》，以为“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病也庸；不温故而知新者，其病也妄”。又谓学者既须强识，还须通悟，“如不能兼，则宁取通悟而舍强识”。《积微翁回忆录》云：“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新者，谓胡适也。”以“温故不能知新者”讥刺黄侃，似非谛论。杨树达早年师从梁启超，受其影响极深。他的批评也不无门户之见。

①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59 页。

②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4—106 页。

只有陈新雄在《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一文中为之辩白：

二十年来，台湾的声韵学会基本上已无学派之争、门户之见。没有想到，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词，开讲不久，就引了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批章太炎先生的话说：“章氏炳麟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年了。”傅斯年当年的讲话是有宣示作用的，也就是要创立以胡适为主的新文学，反对以章太炎为首的传统文学，在那个时代，也许有其意识形态的作用；至于今日，五四运动之功过是非，也尚有许多争论，我们有必要再挑起这样一种新旧之争吗？说老实话，什么叫作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①

《文始》一书是章太炎在黄侃的启发下撰写完成的。^②傅斯年的“大炮”瞄准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问，他将从汉到清的学问全盘否定，后来遭到徐复观的有力反驳。

黄侃很早就认清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这给他以强大的挫折感。外界压力不断积累，使他形成了一种严重的焦虑感。他既渴望得到不朽的名声，又担忧可能被后人否认掉，进而形诸梦。1928年8月8日的晚上，他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梦：

① 陈新雄：《陈新雄语言学论学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9页。

② 黄侃曾经告诉伍一比，他从章太炎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因为章太炎本身没有上过学，虽然在杭州问学于俞樾等人，也完全是旧式的治经路数。太炎是经生加文豪，始终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而非纯粹的学者。章黄之间已经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这是时代的鸿沟。